

熊彼特著作集

# Joseph Schumpeter



## 十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TEN GREAT ECONOMISTS

ynes

约瑟夫·熊彼特 / 著

贾拥民 / 译

熊彼特著作集

# Joseph Schumpeter



## 十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TEN GREAT ECONOMISTS

From Marx to Keynes

约瑟夫·熊彼特 / 著

贾拥民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美）约瑟夫·熊彼特著；贾拥民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5

（熊彼特著作集）

书名原文：Ten Great Economists: From Marx to Keynes

ISBN 978-7-300-24288-0

I. ①十… II. ①约…②贾… III. ①经济学家-评传-世界 IV. ①K81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7869 号

熊彼特著作集

十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约瑟夫·熊彼特 著

贾拥民 译

Shiwei Weida de Jingjixuejia: Cong Makesi dao Kaiens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770（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8.5 插页 3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6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前言

本书所收入的这些文章全都写于1910—1950年这40年间，最早的三篇〔分别关于瓦尔拉斯（Walras）、庞巴维克（Böhm-Bawerk）和门格尔（Menger）〕是用德文写的，其余各篇都是用英文写的。除了关于马克思（Marx）的那一篇之外，其余各篇都已经在不同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过。它们当中，有的是为了悼念某位刚刚逝世的经济学家而写的，有的则是为了某些事件的周年纪念而作的，比如庆祝马歇尔（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出版50周年、纪念帕累托（Pareto）诞辰100周年，等等。因为这些文章都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写就的，所以熊彼特（Schumpeter）本人认为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并没有多大的价值，但是许多人都需要它们，而且原来刊载它们的杂志又不容易找到，所以熊彼特于1950年1月去世前几个月，终于同意由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将它们整理出版。

本书正文共有十篇文章。除了关于马克思的那一篇之外，其余的都是由熊彼特本人亲自挑选出来的。熊彼特本来计划在本书中收录《〈共产党宣言〉中的社会学和经济学》（*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Sociology and Economics*）一文，那是在1949年6月，他为纪念《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发表100周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文章。但是现在我们决定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的第一部分《马克思的学说》（*The Marxian Doctrine*）来取代它，因为它对作为预言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导师的马克思做了更全面的论述。我非常感谢卡斯·坎菲尔德先生（Cass Canfield）和哈珀兄弟出版社（Harper & Brothers），感谢他们慷慨地准许我将《马克思的学说》这篇文章收入本书。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 和《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 等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商,因为他们同意把原先发表在他们杂志上的一些文章收入本书。还有几篇选入本书的文章原先发表于《国民经济与社会政策杂志》(*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不过该杂志现在已经停刊了。

附录中关于克纳普(Knapp)、维塞尔(Wieser)和博特基威茨(Bortkiewicz)的三篇短文是根据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教授的建议而收入本书的。他认为这三篇短文应该重新出版,并且应该与其他传记性文章一起收入同一本书中出版。这些文章是熊彼特担任《经济学杂志》驻奥地利通讯员(1920—1926年)和驻德国通讯员(1927—1932年)期间为该杂志撰写的。1932年,熊彼特离开了德国的波恩大学,来到了美国的哈佛大学。

本书作者与这些传记性文章的主题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仅敬仰这些作者的作品,而且他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熟识(除了一个例外),特别是,他与其中几位还有着深厚的友谊。<sup>①</sup> 再一次,例外出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身上。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而熊彼特则与凯恩斯一样,恰好是在这一年出生的——凯恩斯也是“十位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一位。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把经济发展看成一个过程。在他的《经济发展的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熊彼特试图提出“一种关于经济变化的纯经济理论,强调经济变化不仅仅是建立在推动经济体系从一种均衡过渡到另一种均衡的外部因素的基础上”。在为该书的日文版撰写的序言中,熊彼特写道:“开始时我不清楚,但是读者应该立刻就能看清,[我(熊彼特)本人的]这种思想、这种目标与构成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基础的那种思想、那种目标完全一样。实际上,他[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以及他以前的经济学家的区别就在于他对经济发展的独特看法,即把经济发展看成经济制度本身所导致的一种特定的过程。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所有其他方面,都不过是采用和修改了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观点而已。但是,经济发展的概念,却可以说完全是马克思自己的创见,至于他把这个概念放入黑格尔哲学背景中的做法,其实并不是关键。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才会不断地提起马克思,尽管他们可以从其他

<sup>①</sup> 这是针对正文中的十篇文章而言的。至于附录中的三篇文章所述的那三位经济学家,熊彼特只与维塞尔非常熟悉,他很可能只是遇到过克纳普和博特基威茨。

许多方面批评他。”在他的《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手稿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熊彼特这样写道:“在他[马克思]的思想的总体框架中,发展绝不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眼中的静态经济体系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属物,而是那个时代的经济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分析重点集中在了,阐明在自身的内在逻辑的推动下不断变化的经济过程,究竟是怎样一刻也不停地改变着整个社会的整体结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由此而导致的结果却完全不同:马克思大力谴责资本主义社会,而熊彼特则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的辩护人。

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学这门学科能否取得进步,取决于远见和技术。他既推崇马克思关于经济过程的看法,同时也推崇与他只有一面之缘的瓦尔拉斯(Walras)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谈到瓦尔拉斯的时候,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里是这样说的:“……经济学就像是一辆巨大的公共汽车,上面搭载着许多兴趣和都无法相互比较的乘客。但是单就纯粹经济理论而言,我认为瓦尔拉斯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均衡体系把‘革命的’创造性和古典的综合性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这是唯一可以与理论物理学的成就相媲美的经济学家的作品。”

马克思和瓦尔拉斯截然不同,他们两人各走一个极端:一个试图给出经济变迁的逻辑解释,另一个则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工具,它在我们这门学科的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阐明了各种经济量之间互相依赖的纯粹逻辑”。

熊彼特的特点<sup>①</sup>是:对历史和纯理论性的东西、对计量经济学和收集到的海量事实材料、对社会学和统计学,他都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他认为它们都是有用的。他如此广泛的兴趣也反映在了本书收录的这些传记性文章当中。

他在维也纳学习期间就认识了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门格尔和他的两位弟子——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可以算是经济学中的奥地利学派或维也纳学派的共同创始人。不过,那时门格尔已从大学退休,不再积极参加教学事务,熊彼特只和他见过一两次面。但是关于这几位学者的传记性文章无疑是可信的,因为

<sup>①</sup> 哈伯勒(Haberler)谈及熊彼特的时候曾经说过,熊彼特虽然也有自己的专长领域,“但是,作为经济学所有分支的‘大师’、作为一个通才,熊彼特在当代经济学家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经济季刊》,1950年8月)。

它们的作者是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主持的研讨班的积极参加者（1904—1906年）。后来，熊彼特还与庞巴维克就利息率问题进行过一场著名的论战（*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1913）；而且，1921年，在庆祝维塞尔七十诞辰时，熊彼特是三位发言者之一。

虽然熊彼特接受的是奥地利学派的学术训练，虽然他很看重这个学派思想和著作，但是他却对发展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另一个学派——洛桑学派（the School of Lausanne）——更感兴趣。这个学派源于瓦尔拉斯的著作。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学派的真正创始人其实是帕累托。帕累托是瓦尔拉斯的杰出学生，后来接替瓦尔拉斯在洛桑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一职。一直以来，对于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的著作都显得过于“数学化”和“理论化”了。同时英、美两国的经济学家还发现，阅读用其他语言写成的经济学著作事实上也是非常困难的。（也许根本就是浪费时间！）但是洛桑学派很早就拥有了两位第一流的美国信徒——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和 H. L. 穆尔（H. L. Moore）。本书正文的十篇文章当中，其中三篇就是献给瓦尔拉斯、帕累托和费雪的。在关于帕累托的那篇文章的一个脚注里，熊彼特描述了一次聚会，在会上谈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帕累托对欧文·费雪大加赞扬。熊彼特这样写道：“当我听到他〔帕累托〕对〔费雪的〕《资本和收入的性质》（*Capital and Income*）一书的高度评价时，实在有些意外。”

1906年，熊彼特在维也纳获得学位以后，到英国待了几个月。在那儿他拜访了几位经济学家，并在1907年第一次遇见了马歇尔。1933年12月，熊彼特为《经济学杂志》撰写了一篇评价凯恩斯的传记作品集《精英的聚会》（*Essays in Biography*）的文章。在该文的注释中，他描述了与马歇尔的这次会见。在评论凯恩斯写的关于马歇尔的文章时，熊彼特这样写道：“1907年的某一天的早餐时间，我隔着桌子看着他〔马歇尔〕，然后告诉他说：‘教授，在我们这次（关于我的科学计划的）谈话结束之后，我真的感到我就像是一个轻率的恋爱者，正准备尝试一场冒险的婚姻；而你就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试着劝我放弃这个念头。’而他则回答道：‘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如果年轻人真想在学术方面有什么作为，只听长者的劝告是没有用的。’”被收入本书的关于马歇尔的文章表明，熊彼特对马歇尔的著作是何等地重视。当年，当这篇文章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

表后，熊彼特收到了玛丽·马歇尔于1941年6月寄自英国剑桥的一封短信。信里这样写道：“我刚刚收到《美国经济评论》。现在我正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你写的纪念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文章。我知道你对他的著作一向评价很高，我很高兴你能借此机会如此热烈而恰当地表达了你的赞美。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尤其令我感到欣喜。我也和你一样，非常欣赏凯恩斯写的《纪念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一文。”

1913—1914学年，熊彼特作为一名来自奥地利的交换教授，来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那可能是他第一次与本书一些文章所讨论到的那几位美国经济学家[陶西格(Taussig)、费雪、米切尔(Mitchell)]会面。在此之前，他已经阅读过他们的论著，而且至少已经和陶西格通过信。陶西格于1912年11月27日从马萨诸塞州剑桥给他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陶西格对这位青年经济学家的英文水平大加赞赏，并且讨论了熊彼特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我对于你的论证没有什么异议，但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为，或许应该从一个更现实的角度来探讨这些问题。”陶西格还在信中提供了一些供给图表，然后继续写道：“我很想把同样的论证方式应用于劳动，就像应用于资本和土地一样，以此来构建一种‘租赁’劳动理论。我已经草拟出了一个大纲，准备撰写一篇长文对此问题进行论述。你当然知道，我的朋友J. B. 克拉克以前就进行过这种论证。更晚近一些，欧文·费雪也进行了更详细的论证。这种论证还没有最后的结论。我不是狂妄自大的人，因此不会觉得理当由我来得出最后的结论。但是我确实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贡献。”熊彼特和陶西格的友谊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陶西格于1940年逝世为止。实际上，在熊彼特刚到哈佛大学的头几年(1932—1937年)，他一直和陶西格一起住在斯考特街2号。

同样地，熊彼特对欧文·费雪和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也很钦佩，并且也和他们有一定的感情。他和费雪共同创办了计量经济学会。在某一个周末，当熊彼特前往费雪位于纽黑文的十分俭朴的家做客时，发生了不少趣事。(费雪的家里从来不准备烟、酒、咖啡，而且我相信，甚至连肉都几乎见不到。)咖啡是为这位“堕落的”客人特别准备的。阿尔及尔大学的G. H. 布斯凯(G. H. Bousquer)教授在法文版《政治经济学评论》(*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 1950年第3期杂志上描述了他们的这次会面。本书中纪念韦斯利·米切

尔逝世的文章是在熊彼特逝世前一两个星期才完成的。米切尔和熊彼特都研究经济周期，他们也都相信，要想更好地研究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现象，必须进行最广泛的实证研究。熊彼特不辞辛劳地自己搜集资料，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帮助，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风格，但是对于那些能够明智而有效地利用国家经济部门的有关资料的人，他也十分赞赏。

虽然凯恩斯曾经长期担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而熊彼特从1920年起就是该杂志驻奥地利的通讯员，但是直到1927年，熊彼特才和凯恩斯第一次见面。由于一些很难解释清楚的原因，他们两人的关系，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都算不上密切。

在翻译评述瓦尔拉斯、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那三篇文章时，曾经碰到过一些困难。正如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在他的《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一书的序言中所指出的，也正如哈伯勒早些时候发表于《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熊彼特在用德文写作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风格，因此他的德语文章非常难翻译。哈伯勒说：“他的笔调很有些文学化，用‘奇异的风格’来形容也许最合适。这种风格能恰到好处地表达他的思想的复杂结构。这种风格的特征表现在长长的句子、大量的修饰性短语、修饰语再套修饰语，以及对微妙含义差别的细致辩解上。正如人们所想到的，他的这些风格和特征，在他的德文论著里特别明显，这是因为德语更适合于表达复杂的结构。”熊彼特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关于庞巴维克的那篇文章，他认为那篇文章太长了，从便于英语读者理解的角度考虑，应当加以删改，甚至完全重写。他强调指出，不这样做是“不行的”。

因此，现在被收入本书的关于庞巴维克的那篇文章，与原作相比，篇幅已经少了一半。这项工作是由哈伯勒和这篇文章的译者赫伯特·查森豪斯（Herbert Zassenhaus）教授一起完成的（赫伯特·查森豪斯是熊彼特以前的学生）。在这里，我要表达我对哈伯勒教授以及三位译者——沃尔夫冈·斯托尔珀（Wolfgang Stolper）、汉斯·辛格（Hans W. Singer）和赫伯特·查森豪斯——的谢意，感谢他们的关心和大力帮助。我还要感谢保罗·斯威齐，他和我一起阅读了全部译文，还帮我润饰了多处文字，澄清了许多问题。在一些情况下，对于译文中因过分直译而显得拗口的地方，以及含义过于模糊不清的段落，我不得不冒昧地进行

了一些修改。特别是其中关于庞巴维克的那篇文章，尤其如此。因此，译文如果有什么缺点，那必定是我造成的，因此由我一人负责。

其他文章都是用英文写成的，这次直接按原来的样子发表。

除了订正了一些小的印刷错误，以及为了保持格式的一致而在细枝末节上做了一些小的改动——比如大写字母、标点符号、注释的排列等——之外，就没有再做其他任何改动或修订了。

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 (Elizabeth Boody Schumpeter)

1951年2月2日

于康涅狄格州，塔科尼克

# 目 录

|                       |     |
|-----------------------|-----|
| 卡尔·马克思 .....          | 1   |
| 马里·埃斯普里·莱昂·瓦尔拉斯 ..... | 65  |
| 卡尔·门格尔 .....          | 71  |
|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       | 82  |
|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       | 100 |
| 欧根·冯·庞巴维克 .....       | 130 |
| 弗兰克·威廉·陶西格 .....      | 173 |
| 欧文·费雪 .....           | 202 |
| 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 .....     | 219 |
|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      | 239 |
| 附录                    |     |
| 乔治·弗雷德里克·克纳普 .....    | 273 |
|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 .....     | 276 |
| 拉迪斯劳斯·冯·博特基威茨 .....   | 280 |
| 译后记 .....             | 284 |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 马克思的学说

人类凭着智慧或想象创造出来的作品，绝大多数过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就永远消失了。这段时间，短的可能只是茶余饭后的片刻光阴，长的也很难超过一代人的时间。而有一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曾经黯然失色，甚至几度隐没，但是它们终究又会重现光彩。而且，它们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无法被辨识的一部分重现的，而是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带着人们看得到、摸得着的烙印重新绽放光芒的。对于这些作品，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作品——这个定义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了一起，这并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根据这个定义，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学说。用多次复兴来定义伟大这种做法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可以使其免受我们的喜恶爱憎的影响。对于一个伟大

---

\* 选自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版。经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允许重印。

的作品，我们不必相信它必定是光明的来源，不必认

为它的基本的构思和细节方面必定完全正确、一点错误也没有。恰恰相反，我们可以认为它是黑暗的原力，可以认为它是根本错误的，或者不同意它的任何一个具体观点。事实上，就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而言，这样或那样的非难甚至完全否定并未能给它带来致命的打击，反而更有助于它的力量的发挥。

过去的 20 年见证了马克思学说最令人感兴趣的一次复兴。马克思在苏联备受尊崇，考虑到他作为社会主义信仰的伟大导师的身份，这一点实在不足为奇。在那里，马克思学说经典化的过程的唯一特征是，在马克思学说的真正内涵与布尔什维克的实践和意识形态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这两者之间的距离，至少像卑微的加利利人的宗教（指耶稣及其创立的基督教）教义与中世纪的红衣主教和好战领主的实践及观念之间的差距一样大。

但是另外一个现象却不那么容易解释，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复兴。这个现象之所以非常令人感兴趣，是因为这个事实：在美国，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无论是在工人运动中还是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在那个时候，美国本土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都是肤浅的、不重要的，因而也是没有地位的。此外，布尔什维克式的马克思主义复兴，在那些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国家中也没有表现出类似于美国这样的冲刺式的迸发力。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德国。德国是所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传统最深厚的国家，在那里，一个规模不大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社会主义思潮高涨时期，以及在那之前的经济萧条时期，一直保持着一定的活力，但是社会主义思潮的领导人（不仅包括那些与社会民主党结盟的人，而且包括那些在实际问题上比社会民主党内谨小慎微的保守主义者走得更远的人）却并未对恢复原来的信条表现出多大兴趣。这些人将马克思主义供在神龛上崇拜，但是同时又十分小心地与它保持一段距离，在经济事务上，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与其他经济学家如出一辙。因此，在除了苏联之外的欧美各国，美国的现象是很独特的。或许我们不必过于在意这种现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但是，既然这么多美国人都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自己的信条，那么探讨一下它的总体框架、内容以及意义，应该还是

值得的。<sup>①</sup>

## 一、先知马克思

我并不是因为偶然疏忽而用宗教术语来类比马克思，硬给这一章取这个标题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类比，因为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宗教信仰。首先，对信仰它的人来说，它提出了一个关于最终目的的学说，这种最终目的体现着人生的意义，并且是对各种事件和行动做出判断时的绝对标准。其次，它还给出了实现最终目的的行动指南。它包含了一个救世计划，还指出了人类必须脱离的种种罪恶——人类或那些“被选中”的群体按照这个救世计划行动就能摆脱这些罪恶。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详细说明如下：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也属于那种许诺在人间建立天堂的宗派或学说。我相信，如果有哪位圣典学家（hierologist）愿意系统性地阐明这些特性，那将会为马克思主义的分类和评价提供很大方便；这种分类和评价或许能够比纯粹经济学家的任何阐释都更加深刻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本质。

说马克思主义属于一种宗教信仰，还有另外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好处，那就是，它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如此成功的原因。<sup>②</sup> 纯粹的科学成就，即使远比

① 我将尽可能少地引用马克思的著作，同时也不提供有关他生平的资料，因为这似乎是不必要的。想了解马克思主要著作和他的生平的读者，在随便哪一本辞典中都可以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特别是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中或《社会学科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中。要研究马克思，从《资本论》（*Das Kapital*）第一卷着手最为方便〔最早由 S. 穆尔（S. Moore）和 E. 艾威林（E. Aveling）译成英文，编者是 F. 恩格斯（F. Engels），1886 年〕。尽管最近又出现了大量关于马克思的传记作品，但是我仍然认为 F. 梅林（F. Mehring）的著作是最好的，至少对一般读者而言肯定是这样。

②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反对派的特有态度，也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性来解释。对于这些人来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不但观点错误，而且身怀罪孽。这一点与任何宗教信徒如出一辙。他们不仅从理智上，而且从道义上不允许他人有任何异议。一旦“启示”已经被公之于世，持有异议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马克思所能达到的成就更为完美，也不可能像他的学说这样永垂青史。如果只会喊口号，那么无论他给他的政党准备的口号武器库多么充实，也同样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必须指出，马克思成功的部分原因，虽然只是极小的一部分，确实应该归功于他给他的拥护者们准备好的在任何一个讲坛都随时可用的武器——大量的炽热的词语、激烈的谴责和愤怒的手势。关于这个问题的这一方面，不得不说明的是，这种武器不仅过去曾经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现在仍然在很好地发挥着作用，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为了给社会斗争的“战场”制造这类武器，马克思有时不得不偏离从他的理论体系合乎逻辑地引申出来的结论。然而，如果马克思只是一个会提供一些煽动性的泛泛之论的布道者，那么他早就湮没无闻了。人们从来不会对提供这类服务的人心存感激，人们总是很快就会忘记那些为他们的政治歌剧编写歌词的人的名字。

但是，马克思是一位先知。为了理解他这一成就的本质，我们必须先考察他的时代背景。当时，既是资产阶级物质成就的鼎盛时期，也是资产阶级精神文化极度衰落的时期。那是一个机械唯物主义的时代，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还没有显露出新文艺和新生活方式正在孕育的任何迹象，到处都充斥着令人反感的平庸陈腐的气息。社会上所有阶层都迅速地抛弃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工人世界中仅有的一线光明也消失了 [除了从罗奇代尔 (Rochdale) 和储蓄银行那里还可以得到些许安慰之外]，而知识分子则自称对于穆勒 (Mill) 的《逻辑》(Logic) 和济贫法非常满意。\*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对于数百万人来说，马克思学说中提出的人间社会主义天堂无疑就意味着那新的一线光明和新的人生意义。或许，你大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宗教随意地戏称为是一种冒牌货，或者说它是真正的信仰的戏谑——你还可以有其他许多种不同的说法——但是请不要忽视或不承认他这一伟大的成就。即使所有这数百万人都不能理解和正确评价马克思学说的真正意义，那也没

---

\* 罗奇代尔是英格兰北部的兰开夏郡的一个小镇 (自治市)。1844 年，28 位贫苦纺织工人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工业品消费合作组织——罗奇代尔公平先锋合作社 (Rochdale Equitable Pioneer's Society)，并制定了“罗奇代尔原则”：入社自由、民管理、收益分享、重视教育、恪守中立。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合作组织。——译者注

有关系。这是所有先知及其预言的共同命运。重要的是，马克思的预言是以一种那个时代有实证主义思想的人可以接受的方式组织起来并表达出来的。毫无疑问，实证主义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将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也没有什么不合情理之处。马克思学说的“预言化”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完成的：一方面，它以拥有超乎想象的力量表达方式系统而详细地描述了受挫折和被虐待的心情——这使用自我治疗方法来安慰自己的“失败的大多数”从心底里产生了共鸣；另一方面，它又宣称，社会主义肯定能把人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并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是经得起理性论证的。

那个时代，宗教日趋衰微，只给人们留下了一些超理性的渴望，这更加使得他们彷徨如丧家之犬。以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为主导的时代趋势——这种趋势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却不能容忍任何没有科学内容的或只有伪科学的信条。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些超理性的渴望与理性主义、唯物主义的时代趋势成功地交织在了一起，这是何等高超的技术！只宣传最终目的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只针对特定的社会进程进行分析又最多只能引起少数一些（充其量几百个）专家的兴趣。但是，披着分析的外衣去说教，而且是着眼于人们的深切需要进行直指人心的分析，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赢得了热烈拥护的原因，他们也因此而获得了无上的褒奖。这一褒奖体现在如下的信念中，即他们深信，自己信仰的、为之奋斗的东西绝不会失败，而且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当然，坚定人们的信念只是其全部成就的一个方面而已。个人的力量和预言的光芒，是独立于信条的内容而发挥作用的。没有这些，新的生活和生命中的新意义就无法被有效地揭示出来。但是在这里，这一点与我们关注的重点无关。

尽管关于马克思试图要证明的“社会主义目标不可避免地要实现”这一论点的中肯性和正确性，我们可能得多说上几句，但是关于上文所述的他对“失败的大多数”的心理感觉的系统性描述，则只要说一句话就足够了。无疑，那并不是对这些人的有意识或下意识的实际感情的真实描述。相反，我们倒可以把这种描述看作一种企图的结果：试图以对社会演化逻辑的或真或假的揭示来代替对真实感的刻画。马克思这样做了，同时还把他自己的术语“阶级意识”说成是群众自发的。但是，既然这种“教导”是有效的，马克思就继续扩展和拔高它。他从

从来没有为社会主义的美妙理想流下充满感情的眼泪，这是他自称强于被他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那些人的优点之一。他也没有把工人夸耀为每天都刻苦工作的英雄——资产阶级在为自己能不能分到红利而焦虑时，倒喜欢这样做。马克思从来没有刻意奉承过工人，尽管这种倾向在他的某些不够坚定的追随者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马克思很可能非常了解群众的特点，他的目光远远高于群众，倾注在了整体的社会目标上，这超越了群众的思想境界和需求范围。马克思也从没有拿自己树立的理想去教导别人，他从来没有这种虚荣心。每一个真正的先知都会称自己只不过是上帝的卑微的代言人，马克思也一样，他说自己从未宣讲过历史辩证逻辑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切，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庄严的品质，能够有效地弥补许多偏狭和粗俗的东西。在马克思的著作和生活中，这种庄严的品质和这些缺点形成了一种非常奇异的组合。

最后，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马克思本人的文化修养极高，那些不见舆薪的庸俗社会主义教授们完全不能与他相提并论。他完全有能力理解任何一种文明及其价值的“相对的绝对”价值，不论他自己觉得与这种文明相隔多么遥远。在这一方面，《共产党宣言》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足以证明他的胸襟是何等广阔。在这本小册子里，他热烈地赞扬了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sup>①</sup>，即使在宣布资本主义的未来必然的死刑时，他也从来不曾否认过它的历史必然性。诚然，对资本主义的这一立场包含着许多马克思本人也不愿接受和承认的东西，但是毫无疑问，他的这种立场确实是非常坚定的。由于他的历史理论能够给事物发展的有机逻辑一种独特的表述，因此他也更容易采取这种立场。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上一切事物都有一定的轨道。在他一生中的某些时候，他也许是一个潜伏在咖啡馆中的阴

<sup>①</sup> 这一说法看上去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且让我们看中摘录的一些译文：“资产阶级……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参见《共产党宣言》，3版，30~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译者注）我们看到，上述的一切成就全都只归功于资产阶级，这比许多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宣称的还要彻底得多。这就是我在上面那段文字里要表达的全部意思——这与今天的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以及当代非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派的凡勃伦主义的观点，都是迥然不同的。